

100
CMB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Philanthropy for Health in China

卫生慈善事业在中国

[美] 阮志贞 陈致和 托尼·赛奇 编 | 魏柯玲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卫生慈善事业在中国

[美] 阮志贞 陈致和 托尼·赛奇 编 | 魏柯玲 译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卫生慈善事业在中国/(美)阮志贞,(美)陈致和,
(美)托尼·赛奇编;魏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ISBN 978-7-100-12307-5

I. ①卫… II. ①阮… ②陈… ③托… ④魏…
III. ①医疗保健事业—研究—中国 ②慈善事业—研究—中国 IV. ①R199.2 ②D6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742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卫生慈善事业在中国

[美] 阮志贞 陈致和 托尼·赛奇 编
魏柯玲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307-5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8 1/4
定价: 56.00 元

PHILANTHROPY FOR HEALTH IN CHINA

Edited by Jennifer Ryan, Lincoln C.Chen, and Tony Saich

© 2014 by The China Medical Board

根据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2014 年英文版译出。

本书出版得到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支持。

丛书总序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将近一倍，过去经常发生的灾难性的疾病也得到了良好控制。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应得益于现代医学科学的进步及医学教育的发展，中国的科学家及有关机构也在这百年中逐步成长起来。在此科学道路上孜孜以求的最杰出代表即是有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了解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早期历史以及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努力会帮助我们认识过去，也将有益于我们探讨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未来发展。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 CMB）1914 年成立，到 2014 年，即有百年历史。从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至今，CMB 见证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中国一起经历了极其辉煌的医疗卫生史。值此庆祝一百周年之际，CMB 组织翻译了相关经典英文著作，回顾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和 CMB 合作的历史，以飨中国读者。这一套丛书通过对历史人物、机构及活动的描写，阐述了中国在发展现代医学过程中的成就及其相关的争论。其中有三本书集中描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第四本书则重点讲述了洛克菲勒家族在医疗慈善事业中的开拓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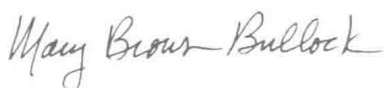
为了向中国读者呈现这段历史，CMB 访问了很多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他机构的领导者。最终，CMB 的顾问委员会决定由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三本著作，其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刘德培、袁明、张大庆和达尔文·斯泰普尔顿等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学者，他们为这些书辛苦作序，向中国读者推荐这几本专著。感谢刘德培教授专门为丛书题字。

还要感谢参与翻译丛书的特别顾问达尔文·斯泰普尔顿、梁其姿、刘德培、袁明、张大庆、张力军、张霞、蒋育红；译者韩邦凯、魏柯玲、闫海英及参加翻译工作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学生等；CMB 的工作人员张烨、李曼玉、阮志贞等。

董事会主席 玛丽·布朗·布洛克

主席 陈致和



2013 年 7 月 11 日

序

ix

我们有幸出版这部有关中国医疗慈善事业所面临的前沿挑战的专著。这一主题已在多个方面显示出其重要性。鉴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随之而来的私人财富的积累，中国已经具备了发展私人慈善的先决条件。

此外，中国最近将深入改革国家医疗卫生体制，以实现平等的全民保健。这对世界头号人口大国而言是个巨大的挑战，它将受惠于私人慈善。国家的卫生需求和慈善机会表明，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专业实践，中国的医疗慈善事业都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专业领域。

我们因共同的目标和经历联手组织这部专著的编纂。盖思南在亚洲的职业慈善事业上倾注了几乎 40 年的心血，他从 1987 年起就担任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在中国的首席代表，并在过去的 25 年中一直活跃在中国，主持各种学术性、非政府性和慈善性组织。他还是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的高级管理顾问，与本书的出版息息相关。

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原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此前他曾担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民政部是包括私人基金会在内的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政府监管机构。他是中国私人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最具理解力

和发言权。

经由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携手策划并筹备了本部专著，以庆祝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百年基业。我们就中国的医疗慈善事业编撰了系列文章，邀请各位作者在两次研讨会上分享了他们的观点。编辑出版的 14 篇文章分 3 个核心主题展开。

我们要感谢参加并承担了编辑工作的陈致和（Lincoln Chen）、阮志贞（Jennifer Ryan）和托尼·赛奇（Tony Saich）。为他们提供大力协助的有金桥基金会的张虹琳（Holly Chang），她帮助安排和组织了作者研讨会，还有史蒂芬·福特（Stephen Ford）、邓肯·哈特 x（Duncan Harte）、孙太一（Sun Taiyi，音译）、大卫·提（David Tea），以及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白书尧（Joshua Bocher）和李曼玉（Mariel Reed），他们帮助完成了翻译、编辑、资料核查及其他工作。我们都为这部史无前例的专著感到骄傲，它关乎中国医疗慈善事业的历史、发展、现状和未来。

盖思南 王振耀

2013 年 8 月 8 日

丛书总序 玛丽·布朗·布洛克 陈致和 /iii

序 盖思南 王振耀 /v

引言 中国的医疗慈善：特色与未来

陈致和 阮志贞 托尼·赛奇 / 1

第一部分 劫后重生

1 中国私人慈善的消亡与再生（1949—2012）

王振耀 赵延会 / 17

2 中国慈善政策与法规的动态平衡

马克·赛德尔 / 36

3 变化中的卫生问题和医疗制度：中国慈善事业的挑战
维维安·林 布朗温·卡特 / 51

第二部分 中国根源和外国参与

4 医学使命——医疗慈善的中国根源和外国介入

张秀兰 张璐 / 79

5 20 世纪在华美国基金会

资中筠 玛丽·布洛克 / 97

6 连接慈善与创新——20 世纪前半叶之中国

达尔文·H. 斯特普尔顿 / 116

7 国际慈善参与中国应对艾滋病的三个阶段 叶 雷 / 133

8 中国的性别与生育卫生：同基金会与联合国的合作

高芙曼 白 梅 李文晶 苏 茜 / 151

9 参与中国控烟的外国慈善项目

杰弗里·考普兰 帕姆拉·瑞德蒙 / 171

第三部分 转变与前景

10 中国卫生慈善发展中的官办非政府组织 邓国胜 赵小平 / 193

11 中国红十字会：过去、现在和未来 李嘉伦 / 211

12 不仅是善款：私人慈善助力残障行业发展 李 凡 / 231

13 香港给内地的卫生与医疗服务慈善捐款 科大卫 / 247

14 让慈善更健康：改革中国慈善事业 徐永光 / 262

术语表 / 274

作者简介 / 277

索引 / 281

引言 中国的医疗慈善：特色与未来

陈致和 阮志贞 托尼·赛奇

导语

全球慈善领域近期有两个令人兴奋的进展——中国新型慈善爆炸式增长的前景和全球健康领域投资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使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令个人财富大量增长。《福布斯》的调查显示，从 2002 年到 2011 年间，中国的亿万富翁数量从 0 增加到 115 位，仅次于美国。财富积累并不仅限于社会最富有的阶层：百万富翁人数增加了 140 万，中产阶层也是全球增长最快的。财富积累和扩散的趋势几乎肯定会持续下去，甚至会加速，所以中国的私人慈善具有广阔的前景，一个全新的、激动人心的时代即将到来。

财富的增加并不是中国慈善迅速发展的唯一原因。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兴起不仅显示出财力资源的存在，也表明民间运用私人财富通过慈善帮助社会的愿望。引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其他因素还有，政府正逐步开放民间力量参与社会服务和救助，因为社会贫富差异变得越来越明显。

与此同时，世界上最大的几家基金会的重要投资已经极大改变了全

球卫生领域状况。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与
2 艾滋病和疟疾等疾病战斗的领军者——巨大的年度预算等同甚至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彭博基金会（Bloomberg Foundation）正通过对烟草、饮食、运动和城市环境的介入尝试先进的公共卫生项目。中国长期被忽视的医疗领域最近已经得到了国家政策层面的优先关注。2009 年，中国政府启动了国家医疗体制的大胆改革。

医疗与慈善两方面的同步进展推动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组织编写了这部关于中国医疗慈善历史和未来的学术专著。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现在的规模并不大，但历史上曾有相当规模。它始建于 1914 年，作为独立的基金会分别于 1928 年和 1947 年两次接受洛克菲勒家族的捐赠。其初始目标是把北京协和医学院建设成中国现代医学科学的旗帜，然而在过去的 30 年间，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已经将其合作关系扩展到了十多所中国的医学院校。经历了整个 20 世纪后，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已经同中国的慈善和卫生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种缘分必定会延续下去；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将于 2014 年庆祝其百年历程，并着手规划下一个百年。考虑未来的工作时，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知道快速变化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医疗领域的不断转变。许多问题自然随之而来：有哪些过去的经验教训可以供未来借鉴？中国慈善的历史根源是什么？中国慈善的特色在哪里？中国医疗慈善事业的现状如何？其未来前景又是怎样？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邀请盖思南和王振耀组织了 14 位作者讲述中国的医疗慈善历史。所编写的章节成形于分别在中美召开的两次学术论坛，代表着前沿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医疗和慈善领域专业人士的贡献。重要的是，这些贡献者反映出中外作者、多个领域的学者及知识界和慈善界专业人士间的积极合作关系。他们中有中国及国际知名学者和慈善界领袖。他们共同提供了第一份关于中国医疗慈善的全面学术研究。

作为联合编纂人，我们负责将所有独立的作品汇编成本书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劫后重生”共三章，描述了在过去半个世纪监管环

境和医疗条件的不断变化中慈善事业的停滞和再生。第二部分“中国³根源和外国参与”共六章，前三章研究了中西慈善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融合，随后分析了美国基金会在20世纪中国的工作；后三章总结了当代中国三个国际推动的项目，分别是艾滋病、生育健康、烟草控制。第三部分“转变与前景”共四章，集中讨论了中国领导的慈善项目及其未来前景。非营利领域目前由积极的官办非政府组织主导，正如对中国红十字会深入的案例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中国真正独立的非营利机构在对六个新设基金会的案例研究中有所体现，对海外华侨通过香港进行持续慈善捐助也进行了分析。大陆、港澳台和海外华侨的捐助均表明私人资金的支持正在形成强劲的补充力量。最后一章着力展示了对医疗慈善领域进行改革以实现私人慈善全部潜能的实例。

五大主题

本书各章重点讨论了五个核心主题，对深入理解当今中国的医疗慈善事业至关重要：它与国家的关系，深远的历史渊源，全球背景下的特色，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机会及其未来。我们将在此讨论前四个主题，最后一个——未来前景——将留在结尾部分讨论。

一幅变动的图景

在中国，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到底有多少家或多少种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和私人基金会，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数据缺乏或相互矛盾，术语定义混乱。第二，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都存在着术语使用上的不准确，如公益、慈善、非政府组织、基金会、非营利机构等，结果是专业术语存在着无数排列组合。

迄今中国最重要的划分方式是官方注册，分别是豁免注册、注册、非注册。首先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许多非营利机构实际上是政府建立的非政府组织，具有一定的规模与权限。它们免于注册要求，接受政府资助，具有向公众筹资的权利。据估计，共有45个政府部门注册了⁴86个官办非政府组织作为公共基金会，即可以主动向公众筹资，有些非政府组织如私人基金会和社会组织则不可以向公众筹资。

关于官方注册的机构数目，根据中国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政府统计数据，2011 年中国大约有 46.2 万家经注册的非营利机构。它们分为三类。社会团体，即社团或协会（贸易的、专业的或行业的），大概占了非营利机构的一半。另外一半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如私立医院、私立学校及某些非营利机构。第三类是基金会，在 2011 年大概有 2600 家，仅占全部非营利机构的 0.5%。所有基金会中约有一半是私立的，一半是公立或与政府有关的。

在数量上，未经注册的机构迄今仍是最大的一类。据估计，2011 年中国约有 300 万家未经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是注册机构数量的 6 倍。它们大部分在政府监管外运营，未注册亦将意味着不受法律保护、不享受税收减免、不被官方认可、银行不提供相关服务。中国政府对这些非政府组织采取“三不”原则——不承认、不取缔、不干涉。有些非营利机构在工商局注册，成为非营利企业。当然，除了非营利组织，还有许多准政府组织，如大学、科学院、研究所和文体机构。

需要注意的是，要获得非营利机构的官方注册非常困难，成功注册也是各有利弊。积极的方面是注册提供了合法性，得到了认可和安全，可以加快人员的签证审批过程，让机构获得银行服务和官方统计等。注册同时也带来了政府的双重管理，即民政部的一般机构监管和根据非营利机构的主业决定的实质性部委的其他专业监管。这种双重监管要求注册的非营利机构定期报告、年度审计以及接受周期性工作检查。

非营利机构可以在各级政府注册——国家、省级、市级，甚至区县级——但其运营范围也局限在注册机构的管辖范围。医疗领域是中国非营利机构关注的第三大领域，仅排在教育和扶贫之后。目前在医疗领域运营的非营利机构有 11 521 家注册社会机构和 70 家注册基金会。

第二个划分中国非营利机构的重要因素就是财务，特别是免税资格。中国 2010 年的慈善捐款据报总计 1030 亿元，2011 年为 840 亿

元，国内生产总值占比不到0.4%，说明自愿捐助水平相对较低。这些捐款分别进入大大小小的基金会，大者如中华慈善总会，2010年收到86亿元人民币，小者如中国移植发展基金会，2010年仅收到31 000元。据估计，有超过90%的捐款汇集在不到1%的非营利机构。只有公募基金会才能接受捐款，非公募基金会则不能。公募基金会中有95%是直接运营，只有30家通过提供资助运营。这些机构绝大部分源自国内。截至2012年，仅有18家外国基金会成功在中国注册。

尽管数量不多，国际基金会在中国依然很重要。2011年，据中国政府估计，国际基金会捐赠了129亿元人民币，其中17%用于医疗领域。这一数字不包括国际资助通过其他渠道进入中国。此外，联合国和国际机构也在中国持续运作，但其资助数量正在减少。国际基金会及机构经常协同工作，虽然时而不能达成一致。

历史渊源

中国慈善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儒释道的施舍思想。在混杂着宗教信仰、道义和乡情的激励下，人们纷纷捐资盖起了寺庙、学校、孤儿院及医院；在饥荒和灾难后提供救助；帮助无力安顿亲人灵柩者安排丧事。朝廷也有所作为，管理对孤寡残贫的慈善救助。例如，从宋⁶朝到皇权结束的1912年，县官普遍设立了济贫院和孤儿院，并补贴急需者的丧葬费。官府偶尔还会和宗教机构共事：在唐朝，官府资助的佛庙设立了粥房和医疗站帮助穷人。在官府之外，由大家族拥有和运转的“慈善机构”为家族内外的穷人提供帮助，对内确保家族和谐，对外维护家族名声。慈善业最好的文字记载始自明朝善堂的首次出现。善堂即由地方士绅支持的非官办慈善组织。它们活跃于多个方面，从为穷人捐助棺木、掩埋灵柩，到募集和发放食物等。在清朝，私人慈善有所扩展，但依然主要限于自己的家乡。富有的商人与当地士绅和官府在杭州、上海和天津等地建立了善堂，在1870年的香港，中国人建立了著名的东华医院，并继续将海外侨民的慈善捐款转向内地。

19 世纪不仅见证了国内慈善的进一步发展，也见证了外国慈善的同步发展。后者最初主要和传教活动有关，尤其是医院的建设。许多中国流传下来的医疗成果皆源自于此。上海的仁济医院可追溯至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44 年在上海建立的华人医院，广州中山眼科中心可追溯至伯驾（Peter Parker）1835 年创办的眼科医局——中国最早的西医院。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民国时期，外国慈善稳步增长，并逐步世俗化。慈善事业发展在该阶段最大的成就或许就是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建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中国国内外慈善的悠久历史在 20 世纪下半叶发展迟缓甚至中断，但无论如何，1949 年前的慈善历史迄今依然非常重要，因为它证明了国内外慈善方式的深远根源。尽管外国慈善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被中断，但早期鼓励并激活国际参与的根基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发挥作用，影响了当下中国私人慈善的复兴。

特色

不同国家的慈善自然有许多共同之处——富裕人群的意愿、公众募捐、对最需要群体的关注、人道危机时高涨的捐助、政府控制机制等。中国展示出所有这些共性，医疗慈善尤其值得关注。

中国慈善有几个特色，它的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受到严重冲击。今天慈善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源自时代的遗留问题，例如重新恢复私人 and 外国慈善的路径，慈善捐助早期的法律框架，以及国家在这一领域持续的控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所有私人活动、非政府组织和慈善事业停滞不前，国内的公民社团和非营利机构，包括传统的善堂，全部被取缔，同时，像红十字会这样的跨国基金会纳入国家范畴，外国的非营利机构纷纷离开。中国开始了市场化的经济增长之后，非营利机构的空间重新打开了。改革开放后，人们认识到了非政府组织捐助的必要和意义，开启了支持非营利机构运行和增长的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仍在建设之中。

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完全停滞之后经历如此大规模

的复兴。开放政府认可的非营利社会组织不过只有 30 余年的时间。这些组织的出现和重要性在 2008 年尤其明显，汶川大地震重新燃起中国的慈善精神，中国公众为人道救援捐助了巨额善款。最近的 2013 年，同在四川的雅安地震也同样激发了举国慈善。

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政府机构都试图监管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注册、免税及报告与许多国家都并无不同。但是在中国，政府监管的作用尤为巨大。是否官方注册决定了机构的合法性和在中国运营的能力。⁸ 随着中国继续允许非营利机构扩展，政府开始在继续控制民间组织发展壮大以免威胁社会稳定的同时，放开非营利机构的生长空间以解决社会问题。这使得服务性的而非独立的或倡导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成为政府的偏爱。

在中国，政府不仅监管慈善，它自身也扮演着主要角色，控制着众多有实力的官办非政府组织。这些大型组织——其中包括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宋庆龄基金会——接受大部分的公众捐款。政府还承担着在其他国家可能由非政府组织承担的社会角色。在医疗领域，中华医学会行使着许多专业功能，如培训、设立专业群体、出版学术刊物、管理专业教育等。与此同时，资助型基金数量极少，功能有限。在中国的 2600 家注册基金会中，只有 30 家是资助型的，其他都是运作型基金。这使国内给真正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资金支持非常有限。

在中国，国外慈善事业的状况与在其他国家运作情况不同，国际组织不易接触纯私人民间机构。外国基金会要受到严格的监管，不论是从其本国汇出资金还是在中国收受资金。在某些总部国家，对外捐助的外国基金会要求确认接收方是合格的非营利机构（即等同于美国的 501（c）机构），而大部分中国未经注册的非政府组织不具有这一资格。同时，中国的法律法规禁止官方待批机构接受外国资金。因此许多外国基金会通过官办非政府组织（如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大学（如为了医学教育和研究），甚至市政府（如为禁烟试验无烟区）运作。联合国机构和世界银行的援助也必须通过官方认可的机